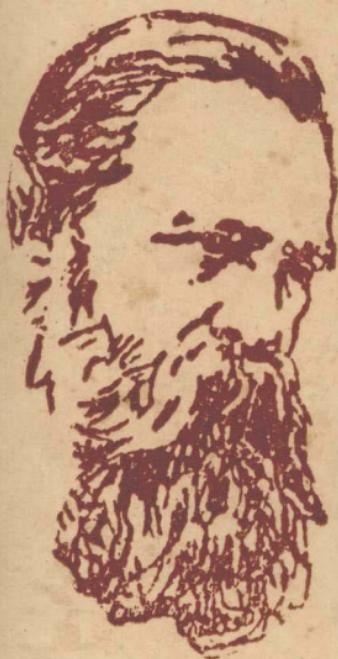


# 唯物論



恩格斯著

新漢出版社印行

146  
GS2



# 史的唯物論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恩格斯  
發行者 新漢出版社  
印刷者 新漢出版社

每册實價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民國七年五月月初版

目 次

史的唯物論

法蘭西唯物論史

馬克思的唯物論及辯證法

五〇

三〇

一

101135

## 史的唯物論

……我很知道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將不爲英國讀者的大部分所歡迎。（註）但如果我們大陸上的人稍爲顧慮到英國的「尊敬」即英國的道學先生的習俗的成見，則我們所處的地位比現在還會更壞。這本書所辯護的是我們所稱爲「史的唯物論」的。而唯物論這個名字對於英國讀者的大多數是刺耳的噪音。「不可知論」尚在流行，唯物論則完全不可能。

（註）這是「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發展」英譯本一八九二年的序文。著者從英文譯成德文。前頭的四頁省略了，牠裏頭所包含的只是些註解，這在德意志是已經知道或不能引起興趣的。「新時代」，第十一年第一卷，一八九二年，十五頁以下，四二頁以下（恩格斯）

可是從十七世紀起一切近代唯物論的搖籃不在別的地方而在英國。

「唯物論是大不列顛的嫡子。牠的經院派學者登司考脫（Duis Scott）已經問過，物質是否能思維。

要成就這個奇蹟，他求助於神底萬能，即他強神學來宣傳唯物論。他還是一個唯名

論者。在英國的唯物論者們，唯名論是主要的要素，像牠一般地是唯物論之最初的表现一樣。

英國唯物論之真的祖先は培根 (Bacon)。對於他，自然科學是真的科學，而感性的物理學是自然科學底最重要的部分。亞那薩哥拉斯及其種子 (Homoioomeren) 和德謨克利特及原子 (Atmen) 常是他的威權。依他的學說，感官是靠得住的，是一切知識的源泉。科學是經驗的科學，牠的成立在於以合理的方法適用於感官所給與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及實驗，這些是合理的方法之主要條件。在物質底固有的性質中運動是第一個且是最優越的，不僅當做力學的及數學的運動，而且是衝動，生命力，彈性力，——借用波墨 (Jakob Böhme) 的術語——物質底苦惱。後者之原始的形式是有生命的，個別化的，固着於牠的，產生種的區別的，本體力。

在唯物論底第一個創始者的培根，唯物論還素樸地包孕着一切方面的發展底萌芽。物質以有詩意的感官的光輝對全人類發笑。反之，這個格言式的學說還充滿了神學的矛盾。

唯物論在其發展的進程中成了偏狹的了，霍布士 (Hobbes) 是培根的唯物論之組

成者。感性失了牠的花輝，而成為幾何學者底抽象的感性了。物理的運動做了力學的或數學的運動之犧牲，而幾何學被宣稱為首要科學了。唯物論應把自己的肉體斬削而變成禁慾的修道士。牠出現為悟性的產物，但牠也發展了悟性之毫無顧忌的結果。

霍布士從培根出發來證明：如果感性給與人類以一切的知識，則直觀，思想及表象等等都不外是多少脫去了感性的形式的感覺世界之幻像。科學只能替這些幻象定名字。一個名字可以適用於許多的幻像。並且名字也可以有名字。但這是一個矛盾：一方面在感官世界中求一切觀念的起源；他方面又主張一個名詞不只有一個名詞的意義，在被表象的常是個別的事物以外還有一般的事務。一個不具形體的實體與不具形體的形體一樣，同是一個矛盾。形體，存在及實體是同一的實質理念。我們不能把思想從思維的物質分開，牠是一切變化底主體。無限這個字是沒有意義，如果這不是表示我們精神底不加以止境的能力。因為只有能被知覺的物質的東西才能知道，所以我們關於神的存在什麼也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是確實的。一切人類的情慾都是終止或開始的力學的運動。衝動的目的物是善。人類與自然一樣，依從同樣法則。權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士把培根集大成了，但他的一切知識和觀念底起源都是在感覺世界這個根本原理却沒有更進一步地確證。

洛克 (Locke) 在他的人類悟性起源論中把培根和霍布士底這個根本原理附以確實的基礎。

像霍布士除了培根的唯物論之有神論的偏見一樣，高林士 (Collins)，多威爾 (Dowell)，高華德 (Coward)，哈德烈 (Hartley)，蒲黎斯德利 (Priestley) 等也打破了洛克的感覺主義之神學的境界。有神論至少對於唯物論者們是不超過免除宗教的一種便利的方法。(註)

(註) 馬克思恩格斯共著，「神聖家族」，佛蘭克福 (Frankfurt M) | 八四五年版，二〇一到二〇四頁。恩格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遺稿集第二卷，二三五到二三七頁)

關於近代唯物論之英國的起源馬克思是這樣寫着。如果現在的英國人特別不以馬克思對於他們的祖先所下的判斷為然，那我們只有替他們惋惜。但這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培根，霍布士及洛克是法國唯物論者底一切先榮的學派之祖先。雖然在陸上和海上德國人和英國人

都戰勝了法國人，但法國的唯物論者却使十八世紀特別成了法國的世紀；而且這一直到那個加冕於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之前也是一樣，我們外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都正在努力要同化於她的結果。

這又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有教養的外國人要在十九世紀中葉住在英國，他常要看到一件事，這就是英國「可尊敬的」中等階級之宗教的頑迷和愚蠢。當時我們都是唯物論者或很急進的自由思想家，我們想不到差不多一切有教養的英國人都相信一切不可能的奇蹟，就是像卜克蘭（Buckland）及曼特爾（Mantell）這樣的地質學家也歪曲他們科學的事實，以致不太與摩西的創世紀之神話相衝突。我們更想不到要找敢把他的理性應用到宗教的事件的人須要到沒有教養的人中，要到「離譙的人羣」中，到勞動者中，特別是要到歐文派的社會主義者中去找。

但此後英國就「開化」了。一八五一年的博覽會撞響了英吉利島國底閉關性之引鐘。英國在飲食、習慣及觀念上漸漸國際化了，國際化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我更加希望某種英國的習慣在大陸上也得到同樣的一般的採用，像別的大陸的習慣在英國一樣。青菜加油的食法在一八五一年以前英國只有貴族知道，現在已傳播於全英國了。但這種傳播也跟着一個大

陸對於宗教事件的懷疑論之不可避免的傳播。不可知論固然沒有像英國國家教會一樣的這樣起勁，但關於尊敬這點，差不多立在與侵禮教派同樣的地位，而且佔了比救世軍還要高的位置。因此，我只能作這樣想，對於從心坎中憐憫和咒罵這些非信仰底進步的多數人們，這會是一種安慰。知道這些新製的觀念不是發源於外國。沒有印上「製於德國」（Made in Germany）這個標號，像許多別的日常用品一樣；反之，這是起源於本來的英國，而她的兩百年前的英國的創始者比他們現在的子孫是走了更長遠的道路。

事實上，不可知論不是忸怩怩的唯物論是什麼呢？不可知論者的自然觀徹底地是唯物論的。全自然界都為法則所支配，絕對抗拒從外部來的影響。但是，不可知論者慎重地附加說，我們不能證明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以外的一個什麼最高的本體之存在或非存在。這個保留在拉蒲拉士（Laplace）很驕傲地回答拿破崙的詢問時或許有牠的價值——拿破崙問，為什麼在大天文家的，「天體力學」一書中連造物主的名字都不提起？拉蒲拉士回答說，「我沒有用這個假設的必要」。但現在我們關於在發展中的世界全體之思想形像就絕對沒有留給造物主和支配者的餘地。如果人們要假定一個屏出於現存的世界以外的最高的本體，則這自身是一個矛盾，而且據我看來，還是對於宗教的人們底感情的一種無來由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同樣地承認一切我們的知識都立在我們的感官所感受的傳達之基礎上。但他接着說，我們從何知道我們的感官是否能給與我們以一個牠所知覺的事物之正確的模象？他更告訴我們：如他說及事物或事物底性質的時候，則實際上他說的不是這些事物及牠的性質本身（關於這些，他不能知道一點確實的東西），而是這些事物及性質所給與他們感官的印象。這的確是一種理解的方法，但如只是單純的辯論，則這方法似乎是很難得達到的。可是人類在辯論以前，他就行動。「在開初就是行動」（Im Anfang War die Tat）  
。在人類的才智發見這個困難以前，人類的行動早就解決了這個困難。布丁的籍明是在吃這個布丁（The Pro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當我們依照我們在事物中所知覺的性質而使用這些事物的時候，當這個時候，我們便是在確切地證驗我們感官知覺底正確性或非正確性。如果這些知覺是不正確，則我們關於這樣的的事物底可使性的判斷也一定是不正確，而我們要使用牠的企圖也一定會失敗。但如我們達了我們的目的，我們知道這個事物是與我們關於她的表象一致而達成了我們使用牠的目的，如果是這樣，則這是一個積極的證據，證明了我們關於事物及牠的性質的知覺在這個範圍以內是與有在於我們外部的實在一致。反之，如我們知道我們是失敗了，則大體上我們不久也會發見失敗的原因；我們就會知道爲

我們證明的基礎的知覺不是牠自身是不完全及皮相的。便是牠沒有經過事實的證實而與別的知覺底結果混連了。只要我們正確地訓練和使用我們的感官，又在爲正當地形成和利用了的知覺所規定的範圍內保持我們的行動方式，則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行動底結果證明了我們的知覺與被知覺的事物底客觀性之一致。沒有過一個這樣的場合使得我們達到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科學地規制了的感官知覺在我們的腦筋中產生關於外界的表象，而這些表象性質上是與現實乖離，或者在外界與我們的感官知覺的中間有一個本來的不可調和性。

但現在又來了一個新康德派的不可知論者，而且說：固然，我們能够知覺一個事物底性質，但不能用什麼感官過程或思維過程來把握事物自身。這個物自如（Ding-an-sich）是在我們的認識底彼岸。關於這點，黑格爾早就已經答覆了：如果你們知道了一個事物底一切性質，則你們也知道這個事物自身；再沒有什麼了，除了這個事實，即所說的事物是存在於我們的外部這個事實，只要你們的感官一提示了你們這個事實，則你們就認識了這個事物底最後的一滴，即康德底那個有名的不能認識的物自如。現在我們還可以附加的說，在康德的時代，我們關於自然物的知識是足夠零細而不完全，以致容許在這個的背後還要假定一個別的神祕的物自如。但自此以後，因科學底巨大的進步這些不能把握的事物都一個一個的被把握

，被分析，且被再生產了。而我們所能製造的，我們就不能再視為不能認識的，對於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化學，有機的實體是這樣的神祕的事物。現在，我們從化學的原素一個一個地知道這些有機的實體，而且不用什麼有機的過程而能製造，固然，我們與最高的有機的實體即所謂蛋白質體底構造之精確的認識還離得很遠，但充全沒有理由，為什麼在幾世紀以後我們不應達到這個認識，且藉這個認識來製造人造的蛋白質。但如達到了這點，則我們同時也創造了有機的生命，因為生命，從牠的最低的形式到最高的形式，不外是蛋白質體之正當的存在樣式。

但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一經做了這個形式的保留，則他的說話和行動就完全像一個無恥的唯物論者一樣，——他本來就是一個無恥的唯物論者。他或許會說：就我們所知道的物質與運動，或現在人們所說的能力是不能產生，也不能消滅，但我們沒有證據說這兩者不是在一個什麼不知的時代產生出來的。可是你們試一把這個自白在一個特殊情形下反轉來對付他，則他馬上就會避開你們而且使你們靜默。抽象地他承認唯心論底可能，而實際上他關於唯心論什麼都不想知道。他會對你們說：就我們所知道及所能知道的來說，沒有什麼世界無體底創造主或支配者；就我們所觀察得到的來講，物質與能力是不能創造，同樣也不能毀滅；對於我們，思維是能力底一種形式，腦筋底一個作用；一切我們所知道的都歸到物質的世界是

爲不變的法則所支配這個事實——等等。所以，只要他是一個受了科學訓練的人，只要他知道一點什麼東西，他就是一個唯物論者。在他的科學以外，在他所不在行的領域內，他把他的無知翻譯成希臘文，而名之爲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似乎是確實的：縱使我就是個不可知論者，我也不能把在這本書裏所述的歷史觀稱爲「史的不可知論」。信仰宗教的人們會笑我，而不可知論者會憤怒地質問我，我的不是想嘲弄他們。所以我希望英國的「尊嚴」——德國人稱爲庸俗之人——也不應太過於驚恐，如果我在英文中，像在許多別的文字中一樣，用「史的唯物論」這個名字來表示那種歷史觀。這種史觀是在社會之經濟的發展中，在生產方法及交換方法之變化中，在社會之起因於此的階級分化中及在這些階級底鬥爭中去求一切重大的歷史的事件之最後的原因及決定的推動力的。

如果我證明史的唯物論就是對於英國的俗人之尊嚴也能有利益，則人們或許更會允許我用這個名詞。我已經指出了這個事實：在四十年或五十年前，每個住在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定會遇到英國的「可尊敬的」中等階級之宗教的頑冥及固執，而使他感着不愉快。我現在要說明的是當時的可尊敬的英國中等階級也並不完全像有智識的外國人所看到的那樣愚蠢。

他們的宗教的傾向會能說明的。

當歐洲脫出中世紀時，日益增長的城市資產階級是牠的革命的要素。在中世的封建制度中所奪取的曾經承認的地位，現在對於牠的擴張力已經是變為太狹小了。資產階級之自由的發展已再不能與封建制度相調和，封建制度必須要沒落。

但封建制度之偉大的國際的中心是羅馬天主教（加特力克）教會。這教會把雖然有內部戰爭的封建化的全西歐統一成爲一個大的政治的全體而與分離的。希臘教的世界及回教的世界對立，牠在封建制度之上飾以神賜的聖光。牠仿封建制度創成了牠自己的教職政治，終於成了一切封建諸侯中的最大的一個，因爲至少一切加特力克教的土地之三分之二是屬於牠的。要在各國個別地打擊這世界的封建制度以前，應先把牠的中心的神聖化了的組織破滅。

但與資產階級底進展同時，科學底強有力的飛躍也一步一步地發展了。天文學，力學，物理學，解剖學及生理學重新又被者究了。資產階級爲要發展牠的工業的生產，需要一個研究自然體底性質及自然力底運動方法的科學。但一直到現在，科學只不過是教會底馴順的婢女，不許超過爲信仰所定立的境界——一句話，牠是一切，只不是科學。現在科學向教會反叛了；資產階級需要科學，且參加了這個這個反叛。

這裏，我只說到正在進展的資產階級必然地要與現存的教會起衝突的諸點中之兩點；但這已經足夠證明：第一，在奧加特力教會底權力地位的鬥爭中最直接關係的正是這個資產階級；第二，當時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都必須帶上宗教的衣裝，且鬥爭必須首先就向着教會，但如從大學及城市商人發出了戰爭呼聲，那一定要在農村羣衆中，在農民中得到強有力的響應，當時的農民到處都在與他們的宗教的和俗世的封建諸侯作堅苦的鬥爭，而且是爲着生存本身，

歐洲資產階級對於封建制度的偉大的鬥爭在三個偉大的決定的戰爭中形成了最高點。

第一個是我們所稱爲德國的宗教改革。響應了路德（Luther）底對教會的反叛之呼聲的有兩個政治的暴動：第一是爲西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所領導的一五二三年的小貴族的暴動，次之便是一五二五年的偉大的農民戰爭。這兩者都被壓伏了，主要地是因爲最有切身利益的城市資產階級底不堅決，這不堅決底原因我們在這裏不能够研究。從這時候起，這鬥爭變成了個個的諸侯與皇帝的中央權力間的鬥爭，結果，使德意志二百年間從歐洲政治地活動的諸國之外消失了。路德的宗教改革的確形成了一種新的宗教，而且是這樣的，絕對專制政體所正需要的新的宗教。東北部德意志的農民才一信「路德教」，他們也就從自由

人降爲農奴了。

但路德所失敗的，喀爾文（Oalain）却成功了。他的教義正適合於當時最急進的資產階級。他的天選論（Gnadenypal）正是這個事實底宗教的表現，即在商業世界中的競爭成功或破產是不依屬於個人底活動或手腕，而是依屬於不爲他所支配的環境。「所以這不在於某個人底意志或經歷。而是在」優越的然而不能知道的經濟力之「憐憫」。而且這在一個經濟的變革的時代，特別是真確的，在那個時代，一切舊的商業路線和商業中心都爲新的所壓倒了，美洲和印度在那時代開放於世界了，就是那最寶貴的經濟的聖物——金和銀的價值——也在那時代起動搖而趨於崩壞了。關於這點，喀爾文的教會制度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神的王國既然共和化了，這世上的王國那還能隸屬於帝王，主教及封建的諸侯嗎？如德國的路德教成了德國的小諸侯手中的馴順的工具，則喀爾文主義在荷蘭創立了一個共和國，又在英國特別在蘇格蘭創立了許多強有力的共和黨。

資產階級底第二個大暴動在喀爾文主義中完全找到了牠的鬥爭理論，這次暴動是爆發於英國。城市的資產階級自己也加入於這個運動，鄉村的中農（Yeomanry）使鬥爭得到了勝利。這是非常奇怪：在一切這三個資產階級的大革命中，農民供給軍隊，贊助戰爭，而農

民又正是這個階級，即在勝利後因這個勝利之經濟的結果最確實地要壞滅的階級，在克林威爾（Cromwell）一世紀以後，英國的中農就好像消滅了一樣。但無論如何，只因為中農和城市底平民要素的參與，這次鬥爭才能達到最後的決定的勝利，才能把查理士第一（Charles I.）推上斷頭台。為了要把資產階級底這些很有收穫的勝利果實得着保障，就一定要使革命特別超過其原來的目的——完全像一七九三年在法國和一八四八年在德國一樣。這事實上似乎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法則之一個。

在這個革命活動底過火後接着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反動也遠越過了牠自身的界線。經過了許多動搖之後，終于也確立了一個新的重心，且這重心做了更向前發展的出發點。英國史的偉大時期英國的庸俗之流竟稱之為「大叛逆」，而隨後的鬥爭僅得到了一六八九年的比較微小的事件這個結果，可是自由派的歷史家反稱之為「光榮的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這個新的出發點是正在抬頭的資產階級與從前的封建的大地主間的妥協。這些封建地主雖在當時和現在都稱為貴族，其實早就已經在轉變為——路易菲立普（Louis Philippe）在法國許久以後才做到的——國家底第一個資產家。這是英國的幸運：舊的封建貴族都已在舊

在戰爭中自相殘殺殆盡了。他們的後裔，雖然大部分也是出身於同樣的舊世家，可是他們的來路是這樣的與從前不同，以致形成了一種完全新的團體；他們的習慣和傾向與其說是封建式的，不如說是資產階級式的；他們完全知道了貨幣的價值，且以綿羊驅逐了幾百個小佃戶來企圖地租的增加。亨利第八分贈及浪費了教會的財產，因此造成了一大羣的新的資產階級地主；一直到十七世紀來還繼續不斷地沒收許多的大財產而分散給全暴發戶或半暴發戶的事也得到同樣的結果。所以，從亨利第七以來，英國的「貴族」不但沒有妨害工元的生產底發展，反想從中得到利益。同樣地，因為經濟的或政治的動機，大地主的一部分都時常準備着來與財政的及產業的資產階級之領袖合作，這樣，一六八九年的妥協因而很容易地成功了。政治的掠奪品——地位，官職，大的薪俸——都還在鄉村貴族的手裏，只要他們顧慮到財政的，產業的及商業的中等階級之經濟的利益，而這個經濟的利益在當時是已經充分地強大；牠終於決定了國家底一般的政治。關於個個的問題人們儘管有議論，但貴族的寡頭政治却很知道他們自身底經濟的繁榮是怎樣的與產業的及商業的資產階級之經濟的繁榮不可分離地連繫着。

從這時候起，資產階級成了英國的統治階級之謹慎的然而是公認的成素。在壓迫全國的

廣大的勞苦羣衆這點牠與其餘的成素是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手工工廠主對他的夥計，工人及僕人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像英國人在稍前所稱的「天然上司」的地位，他必須從他們儘可能的榨取多而且好的勞動；為這個目的，他又必須訓練他們養成一種適應的服從心，他自己是宗教的，他的宗教給了牠一個旗幟，在這旗幟之下他曾與國王及貴族作過鬥爭。不久他也發見了宗教所給與他的工具，可用來改造他的天然下屬之靈魂，使他們服從主人的命令，這主人是上帝底不可詢問的決議置在他們上頭的，簡單說，英國的資本家現在也參加「下層階級」的壓迫，全國廣大的生產羣衆的壓迫，而所使用的工具中的一個便是宗教的感化。

但另外又來了一件事實使資產階級底宗教的傾向更加强盛：這就是英國唯物論的發生。這個新的無神的說不但惱怒了敬虔的中等階級，牠還宣稱牠只是適合於學者及有教養的人們的哲學，而與恰好適合於沒有教養的，連資產階級都算在內的廣大的羣衆之宗教對抗。霍布士一出，唯物論就當做國王特權的辯護者而踏上了舞台，而且幫助了專制君主來壓迫那個強壯的而是惡劣的小孩（Puer rorputus sed malitiosus）——平民。而在霍布士的後繼者波林布洛克（Bolingbroke）及沙伏茨布利（Shaftesbury）等，這個唯物論之新的自然神論的形式仍就是貴族的祕傳的學說，因此，資產階級不但因為牠的宗教的異端而厭惡，

也因為牠的反資產階級的政治的關係而厭惡。爲要對抗貴族的唯物論及自然神論，因此也創立了新教派，這新教派是供給了反對斯圖亞特（Stuart）王朝的旗幟和戰爭，同樣又成了資產階級底主要的鬥爭力，現在也還形成了「大自由黨」的骨格。

在這派中間，唯物論從英國移植到了法國。在法國，牠遇到了從笛卡兒哲學派生出來的第二個唯物論的哲學學派而與融合。就是在法國，牠開始也仍就是完全貴族的學說。可是即刻牠的革命的性質就顯露了。法國的唯物論者們不把他們的批判制限於單純的宗教的事情，他們批判當時的一切科學的傳統，批判當時的一切政治的制度。爲要證明他們理論之普遍的適用性，他們就取了最近的路線：他們大胆地在一部巨大著作中，即他們所稱爲「百科全書」中把唯物論應用到一切知識底對象。這樣。種種形式的唯物論——當做公開的唯物論或自然神論——成了法國有教養的青年全體之世界觀；而且是在這樣的程度，以致在大革命期中，英國王黨所定立的學說倒給了法國共和黨及恐怖黨以理論的旗幟，且做了「人權宣言」的基礎。

法蘭西的大革命是資產階級底第三次暴動，但却是完全脫去了宗教之衣裳而毫不掩飾地站在政治的地盤上的鬥爭之第一次。但這也是鬥爭繼續到底，使交戰的一方即貴族消滅而另

一方即資產階級完全得到勝利的鬥爭之第一次。在英國，革命前的制度與革命後的制度之不斷的連續性及大地主與資本家間的妥協在裁判所的判例之連續性中及在封建的法律形式之尊敬的保存中找到了牠的表現。在法國，則革命完全打斷了過去的一切傳統底關係，掃蕩了封建制度之最後的遺跡，而在民法（Code Civil）中創立了舊羅馬法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的關係之非凡的適應，——這差不多是從馬克思所稱爲「商品生產」的經濟的發展階段發生的法律關係之完全的表現。這個適應是這樣的非凡，以致革命的法國法典在現在也還是一切國家——連英國在內——改造財產法時的模範。但我們有不要忘記的一件事。如果英國的法律繼續把資本主義社會之經濟的關係用野蠻的封建語言來表現，這種語言與所表現的事物是這樣的完全適合，就像英文的寫法對英文的發音一樣——有一個法國人說過：「你寫的是倫敦，但你讀的是君士坦丁堡」——則這個同一英國法律也是唯一的法律，這樣毫不改地還保存着，並且將人身的自由，地方自治及除法庭以外不受任何人的攻擊的保障之最好的部分，簡言之，古代日耳曼民族的自由之最好的部分移植到美洲現各殖民地，——這些日耳曼民族的自由在絕對君主專制之下的歐洲大陸是早已沒有了，而現在也沒有在什麼地方再完全恢復起來。

我們再回到英國的資產階級。法蘭西大革命給了牠一個很好的機會，藉大陸的專制君主

的助力來破壞法國的海上貿易，併吞法國的殖民地及壓制法國對於海上競爭之最後的要求。這是英國資產階級之所以壓抗法國革命的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法國革命的方法很不合牠的脾味。不只是「應處咀呢的」恐怖主義使牠痛恨，就是想把資產階級的統治推行到極端的企圖也已使得牠不喜歡。若沒有貴族，英國的資產階級在世界上能做些什麼？這些貴族是給牠以文雅的態度，替牠發明了時髦的服裝，供給牠以陸軍軍官去維持國內秩序，以海軍軍官去掠奪殖民地及國外市場，假使沒有這些貴族牠能行嗎？——固然，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小部份的進步份子，他們在妥協中是沒有得到多大的利益的；這一小部分是出自更不富足的中等階級，他們同情於革命，可是在議會中是沒有力量的。

這樣，唯物論越發成了法國革命的信條，敬神的英國資產階級也越發把持了他們的宗教，巴黎的恐怖時代不是已經證明了如果民衆失去了宗教會要鬧出什麼亂子來嗎？唯物論越發從法國傳播到鄰邦而因各派類似的理論的潮流尤其是德意志哲學愈加強固，唯物論與自由思想在大陸上一般地越發成了有教養的人之必需的資格。英國的中等階級也就越發固執了他們無數派別的宗教的信條。這些信條也許是各不相同，但都毫無疑義地是宗教的基督教的信條。

當革命在法國確立了資產階級之政治的勝利的時候，瓦特（Watt）·阿克萊特（Aark-Wright）·卡特萊特（Cartwright）及其他諸人在英國誘導了一個產業革命，而完全轉動了經濟的勢力之重心。現在資產階級底財富比土地貴族底財富增長得不可計量的迅速。就是在資產階級的內部，財政貴族及銀行家也都越發擠到工廠製造家的背後了。一六八九年的妥協，就是後來根據資產階級的利益漸次地修正了的這個妥協，已再不適合於變化的相互的地位了。這兩者的性質都已經起了變化，一八三〇年的資產階級與前世紀的資產階級已是大不相同了。還留在貴族手中的，爲抵抗新的產業資產階級的要求而使用了的政治的權力已經是與新的經濟的利益再不能調和了。反對貴族的新的鬥爭成了必要的了。這種鬥爭只有新的經濟勢力之勝利才能完結，受了一八三〇年的法國革命的刺戟，選罷法修正案才不顧一切的反對而通過了。這選舉法給了資產階級在會議裏一個公認的且有力的地位。隨後又來了穀物法的廢除，這一舉就抬高了資產階級，特別是最活動的部分的工廠製造家對於貴族的優勢。這是資產階級之最大的勝利，但也是資產階級在牠本身固有的利益內所得到的最後的勝利。一切後來的勝利，資產階級就不得不與一個新的，開初是同盟者，但後來又是敵人的一社會的勢力分派。

## 產業革命產生了一個大工廠資本家的階級，但也產生了一個更廣大的工廠工人的階級。

這個階級在產業革命從一個生產部門擴大到別一個生產部門的同一的比例上，繼續地發展了牠的數量。但數量發展，同時他的力量也發展，而這個力量在一八二四年強迫頑強的議會廢除禁止集會自由的法律時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在修正選舉法的運動時，工人形成了改革黨的急進派。當一八三二年的法律奪去了他們的選舉權的時候，他們就在人民憲章（Peoplis Charter）中括了他們的要求，且自己組織成了獨立的憲章黨（Chartistempartei），而與反對穀物法的大資產階級政黨對抗，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第一個工人政黨。

隨後一八四八年二月和三月的大陸革命又爆發了，在這革命中，工人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至少是帶着他們的要求在巴黎踏上了舞台，而這些要求，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立場看來，是決不能允許的。次之就跟着來了普遍的反動最初是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憲章黨的失敗：其次是同年六月巴黎工人暴動的失敗；又其次是一八四九年在意大利、匈牙利及南部德意志的事變：最後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路易邦拿巴特（Louis Bonaparte——拿破崙第二）在巴黎的勝利。這樣，工人的要求之勢力，至少在有一個時代是被壓伏了，但是去了怎樣大的代價！所以在從前，英國的資產階級早就已經相信有把一般民衆澆化於宗教的感情中的必

要，現在在一切這些經驗之後不更要迫切地覺得有這個必要嗎？英國資產階級毫不顧慮其大陸同僚之譏笑，年復一年的把幾百萬金錢用之於下層階級中的福音宣傳。不滿足於他自己的宗教工具，他還利用了當時的宗教企業之最大的組織者 Bruder Jonathan，又輸入了美洲的復活主義（Revivalismus），摩提（Moody），桑開（Sankey）及其他等等。最後他還接受了救世軍之危險的援助，這救世軍是復活了原始基督教底宣傳方法，以貧民為選民。以宗教的方法來與資本主義鬥爭而保存在原始基督教的階級鬥爭底要素，對於現在替牠出他的富翁們，將來總有一天要發生很大的危險。

這好像是歷史發展底一個法則：資產階級無論在歐洲的那一個國家都不能像中世紀封建貴族所用的那樣獨佔的方法奪取政治權力——至少是不能有很長久的時期，就是在封建主義完全被掃蕩了的法國，資產階級當做整個的階級也只在很短的期間獲得了支配權。當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在路易菲立普的統治下的時候，只有小部分的資產階級統治法國，其餘的大部分則為很高的標準剝去了選舉權的。在第二共和國底下，全資產階級統治着，但只有三年；牠的政治上的無能開拓了第二帝國的道路，只在第三共和國下，資產階級才整個地繼續了二十年的統治權，但現在牠却已經發展了崩潰之可喜的徵兆了。資產階級之長期的統治現

在只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才為可能，因為美國本來就沒有封建制度存在，而社會開始就是建築在資產階級底基礎之上的。然就是在法國和美國，資產階級底承繼者——工人也已經在響地敲着門了。

在英國，資產階級從沒有經驗過完全的統治權。就是一八三二年的勝利也差不多讓貴族獨佔了一切高級的政府機關。富裕的中等階級情願自處於從順的地位，在我沒有聽到自由派的大工廠製造家福斯特（W.A.Forster）底演說以前是不能理解的。他在他的演說中勸布拉德福特（Bradford）的青年為自己的出身起見還應學習法文，他并述他自己是曾經經過這樣的困難，因為他做了大臣的時候，他就不得不時來往於一個社會，在這社會裏法文至少是和英文同樣的重要，而且事實上，當時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普通都是些沒有教養的暴發戶，不管是好是壞，也只好把一切較高的政府地位讓給貴族，因為在這些機關裏，除了為商業上的狡猾所養成的島國的偏狹和島國的驕傲以外，還需要別的性質的。（註）

（註）而且就是在商業中，這個國民的偏狹愛國主義之驕傲也是不利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國工廠製造家還以為英國人說外國話是失去自己的尊貴。他們頗以外國的「可憐的鬼」住在英國而且替他們把生產品運到外國去的事為足自豪。他們却從沒有想

到，這些外國人，大部分是德國人，即因取此得了英國的對外貿易——輸入和輸出——之大部分。而英國底直接的對外貿易漸漸地只限於殖民地，中國美國和南美的範圍了。他們更沒有想到，這些德國人與在外的別的德國人從事商桑，而漸漸地在全地球上組織了一個殖民地底完全的貿易網。但當四十年前德國熱心地開始製造輸出品的時候，在這些貿易殖民地中却發見了一個可驚的良好的工具，使德國在很短的期間從農產物輸出的國家能變為第一等的工業國家。終於約在十年前英國的製造家起了恐慌，而且質問他們的公使和領事，為什麼他再也不能保持他的顧客呢？這一致的答覆是：（一）你們不學習你們顧客的語言，倒希望他們來學你們的語言；（二）你們從沒有想法來滿足你們顧客底要求，習慣和嗜好，倒希望他們來採用你們英國的要求，習慣和嗜好。（恩格斯）就是在現在，新聞上關於「中等教習」（Middle Class Education）的沒有止境的論議還表示了英國的中等階級還沒有資格够得上最好的教育，而在找尋更次一等的教育。在穀物法廢除以後這也是很明白的，取得了勝利的人們如哥布丁（Cobden），布萊特（Bright）及福斯特（Foster）等也不能參加國家政府機構，直等到二十年後一個新的選舉法修正案才給他們開了一條到內閣去的門路。直到現在，英國的資產階級還深深的為他自己的社會地

位的卑賤之感情所支配，所以牠以牠自己的及國家的經費豢養一個怠惰的寄生階級，這階級在一切的機會是應很光榮的代表民族的。而且牠還要覺得非常的光榮，如果任何一個資本家有資格可以允許加入資產階級自己所造成的這個天選的團體。

這樣，工業的和商業的中等階級還沒有達到完全可以從政治的權力驅逐封建貴族這樣強力力的時候，一個新的競爭者——工人階級又已經出現於舞台了。憲章運動及大陸革命以後的反動和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六年的英國產業之空前的發展（這通常只歸功於自由貿易，但其實還是應歸功於鐵道，海洋汽船及交通機關之巨大的發展）又使得工人屈服於自由黨底影響之下，現在也和憲章運動以前的時代一樣，工人是形成了自由黨底急進派的。但工人對於選舉權的要求漸漸地成爲不可抵抗的了；正當自由黨的領袖們（Whigs）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狄斯拉里（Disraeli）却證實了他的深謀遠慮：他利用了對於保守黨（Tories）的良好時機，在城市的選舉區中指導了以家庭爲單位的選舉權（這包括了住有單獨的房屋的一切的人）同時也變更了選舉區制。即刻又有無記名投票（The ballot），一八八四年又把以家庭爲單位的選舉權擴張到一切鄉村的選舉區中，又製定了一個選舉區的新的分配，使得各選舉區至少可以平均。這些一切都是增加了工人階級在選舉時的勢力，增加到了這樣的程

度，以致現在在一五〇到二百的選舉區中他們佔到了選舉人的多數。但除議會制度以外，沒有更好的訓練對於傳統的尊敬的學校！如果中等階級（資產階級）以信心及畏敬來對待曼勒爵士（Lord John Manner）所戲稱為的「我們的老貴族」，則當時的工人羣衆也以尊敬及謙恭來對待當時所謂的「更好的階級」——資產階級。而事實上，十五年前的英國工人是模範工人，他們對於勞動給與人的地位之尊敬的顧慮及他們不敢提出自己要求的抑制及怯懦是在德意志講壇社會主義者們所受的創傷中注了一副鎮痛劑——這創傷是從他們本國的德意志工人之不可救藥的共產主義的及革命的傾向所受來的。

但英國的資產階級到底還是很好的生意人，他們比德意志的教授們看得更遠。他們只是不願意地與工人分了他們的政權。他們在憲章運動的時代學到了那個「頑強的然而是惡劣的小孩」（平民）能做出些什麼。自此以後，人民憲章之最大的部分迫使他們不得不承認，而且變成了國法。現在比從前是更應該用道德的方法來壓制平民；而在羣衆中起作用的第一個且最重要的道德的方法仍就是——宗教，因此，大多數的牧師佔據在學校的講壇上，資產階級為種種派別或敬虔的煽動——從崇福教（Ritualismus）到救世軍——所拿出的自己的經費也一天多似一天。

現在，英國可尊敬的俗人對於大陸的資產階級之自由思想及宗教的冷漠得到了勝利了。法國及德國的工人已經變成了叛徒。他們全體都沾染了社會主義，而且他們有很好的理由不再心醉於奪取支配權的手段之合法性。這個強壯的小孩事實上越發一天一天的變成惡劣的了。剩給法國和德國的資產階級的最後的方法只有使他們的自由思想消沈下去，就完全像一個粗暴的青年在船暈漸漸侵到了他的時候也不得不把在陸上引以自誇的燃着的雪茄丟掉一樣，除了這個，還有別的什麼方法？一些輕佻的人們也一個一個的都裝出很敬虔的態度，很尊敬地談論教會，牠的教養及習慣，而日在不得已的範圍內自己也依從這些習慣，法國的資產者在星期五日吃素，德國的資產者則在教會裏的椅子上拚命的在聽新教教士的說教。他們真的沾着了唯物論了。「宗教應該為平民所保存」——這是從整個沒落拯救社會之最後的且唯一的方法。不幸的是他們在儘量的破壞了宗教之後才發見這個方法。現在，輪到英國的資產者出來報復的時候了，他們嘲笑着說：「你們蠢才，我在兩百年前早就已經給你們說過了！」可是，不管是英國資產者之宗教的頑迷也好，不管是大陸資產者之臨時抱佛腳的改宗也好，我恐怕都不能制止在高漲的無產階級的巨潮。傳統是一個大是阻障的力量，牠是歷史底惰力。但這完全是被動的，所以定會被屈服。而宗教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之永久的防堤。如

果我們的法律的，哲學的及宗教的觀念都是支配一個社會的經濟的關係之直接的或間接的產物，則在經濟的關係根本地改變了以後，這些觀念也不能長此存在。或者是我們相信一個超自然的啓示，要不然，我們就要承認任何宗教的說教都不能支持一個正在崩潰的社會。

而事實上，就是在英國，工人也又在重新開始運動了。毫無疑義地他們是被種種的傳統所束縛着。一個資產階級的傳就——非常普遍的迷信，英國只能有兩個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而工人階級必須藉大自由黨的助力而得到自己的救濟。一個從獨立的行動之最初的嘗試的時候所遺留下來的工人傳統——在許多舊的工會中開除了一切沒有經過正當的學徒時期的工人；但這不外是這樣的工會自己養成了自己的罷工破壞者，但不管怎樣，英國的工人階級是在開始向前近了，就是布練太諾教授（Professor Brentano）也不得不悲愁地將這個事實報告給他的講壇社會主義的朋友。像英國的一切的事情一樣，工人階級是在以遲緩的沉着的步驟向前進了；這裏表示遲疑，那裏却得到多少良好的結果；牠有些地方對於社會主義這個名字表示過分的不信用，但事實上却漸漸地採取了牠的內容。牠開始在運動，而這個運動一層一層地獲得了廣大的一人羣衆。現在，牠已把倫敦東區的無教育的工人從死一般的睡眠中喚起了，而我們又都知道這個新的勢力是還給了牠一個怎樣偉大的動力。如果運動的進行

沒有取得和沒有耐性的人們同樣的步驟，則這些人們也不會忘記，正是這個工人階級才產生地保持了英國國民性之最好的方面，而一經在英國達到了的每個前進的一步是永遠不會再失掉的。如果舊憲章運動者的兒子辜負了人們的期待，則孫子是不會殄辱他的祖父的。

但歐洲工人階級底勝利是不專依賴於英國的。至少要有英國、法國及德國的合作，這個勝利才能够得着保證。法國和德國的勢力運動是比英國的進步得多。在德國，牠離開勝利的距离的可以計算的。二五年來在那裏所達成的進步是不可比擬的。牠以常在增長的速度向前進行。如果德國的資產階級證明了牠在政治上的能力，規律，勇氣和勢力是感到了怎樣悲慘的缺乏，則德國的工人階級表示了牠很豐富地具有了這些一切的性質。在差不多四百年以前，德意志是歐洲中等階級底第一次大暴動之出發點；在現在的形勢之下，德意志也成爲歐洲無產階級底第一次大勝利之舞台是不可能的嗎？

# 法蘭西唯物論史

馬克思

## 法蘭西唯物論史（註）

（註）參照「神聖家族」遺稿集第二卷，二三二頁到二四二頁。

「正確地且在散文的意義上來說」十八世紀的法國的啓蒙主義尤其是法國的唯物論不只是對於現存的政治制度和現存的宗教與神學的鬥爭，而且也是對於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對於一切的形而上學，特別是笛卡兒的，馬爾布蘭施（Malebranche）的，斯賓諾沙的及萊布尼茨（Leibniz）的形而上學的公開的公然的鬥爭。人們以哲學與形而上學對立，像費爾巴哈在最初反對黑格爾所決定的態度時以清醒的哲學與爛醉的思辨對立了一樣。爲法國的啓蒙主義特別是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所戰敗了的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在德意志哲學中，尤其是在十九世紀的思辨的德意志哲學中又體驗了牠的勝利的內容豐富的復活。在黑格爾以天才的方法把牠與從來一切的形而上學及德意志的觀念論結合而建設了一個形而上學的世界王國以後，像在十八世紀一樣，對於思辨的形而上學及一切的形而上學的攻擊又復影響了對於

神學的攻擊而發生了。形而上學將會永遠屈服於因思辨自身的勞作所完成而與人道主義一致的唯物論之上罷，但像費爾巴哈在理論的領域上一樣，法國的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實踐的領域上表述了與人道主義一致的唯物論。

「正確地且在放文的意義上來說，」法國的唯物論有兩個傾向，一個導源於笛卡兒，另一個則導源於洛克。後者特別是法國的教養要素，而直接注入於主會主義中。前者即機械的唯物論成了特有的法國的自然科學。兩個傾向在發展的進程中互相交錯。直接道源於笛卡兒的法國的唯物論，我們在這裏不必深究，就像不必深究牛頓（Newton）底法國學派及法國的自然科學一般底發展一樣。

所以只這點就够了：笛卡兒在他的物理學中給了物質一個自己創造的能力而以機械的運動爲牠的生活行動（Lebensakt）。他把他的物理學完全與他的形而上學分開了。在他的物理學中，物質是唯一的實體，存在和認識之唯一的根據。

機械的法國的唯物論與笛卡兒的物理學緊密地結合，而與他的形而上學對立。他的門徒是職業的反形而上學者即物理學家。

這個學派是始自醫師魯洛亞（Laroy），到了醫師卡巴尼（Cabanis）即達到了牠的頂

點，而醫師拉梅特利（Lamettrie）是牠的中心。當魯洛亞把動物之笛卡兒的構造——像十八世紀的拉梅特利一樣——轉移到人類的心靈，而說明心靈是身體的樣態（Modus），觀念是機械的運動的時候，笛卡兒還在活着。魯洛亞甚至相信笛卡兒把他的真意隱藏了。十八世紀的終末，卡巴尼在他的著書，「人類的身體與道德之關係」（Rapport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一書中把笛卡兒的唯物論完成了。

笛卡兒的唯物論直到現在還存在於法國。他在機械的自然科學中是有很大的結果，在這裏，正確地且在散文的意義上來說，人們對於浪漫主義的非難會最少罷。

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在法國，特別是笛卡兒所代表的形而上學——從牠的誕生時起就有唯物論爲牠的反對者。個人地，唯物論與在加森提（Gassendi）——愛皮苦爾（Epikur）的唯物論之復興者——的形態上的笛卡兒對立。法國的和英國的唯物論常與德謨克利特（Demokrit）及愛皮苦爾有一個密切的關係。英國的唯物論者霍布士是笛卡兒的形而上學之另一個反對者。加森提和霍布士在死後許久，即在他們的反對者當做公認的權力支配了一切的法國學派的時候，戰勝了這些反對者。

伏爾泰（Voltaire）說過：十八世紀的法國人對於Jesuit派及Jansen派的爭端之冷淡

與其說是爲哲學所引起的，不如說是爲洛（Law）的財政的思辨所引起的。這樣，人們可以從十八世紀的唯物論的理論來說明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之沒落，只要可以從當時法國的生活之實際的形態來說明這個理論的運動自身。這個生活是向着直接的現在，現世的享樂及現在的利益，即地上的世界的。牠的反神學的，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實踐非得與反神學的‘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的理論適應不可。形而上學實踐地失去了一切的信用。我們在這裏只須簡單地指示理論的途徑。

形而上學在十七世紀（人們想起笛卡兒，萊布尼茨等罷）還混雜了些實證的世俗的內容，牠在外觀上似乎是屬於牠的數學，物理學及別的精密的科學中做成了許多的發見。在十八世紀的初頭，這個外觀已經消滅了。實證的科學已經從牠分離而形成了獨立的領域。正當實際的存在及地上的事物開始把一切的利害關係集中於自己的時候，全部形而上學的財富只存在於思想物及天上的事物中了。形而上學成了乾枯的東西了。在十七世紀的法國最後的偉大的形而上學者，馬爾布蘭施和亞爾諾爾（Arnauld）死了的同一年，黑爾惠修斯（Helvétius）和孔狄惹克（Condillac）誕生了。

理論地剝奪了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及一切的形而上學的信用的人是皮愛爾貝爾，（Pierre

tre Bayle)。他的武器是從形而上學的魔術的形式鍛鍊出來的懷疑主義。他自己最初是從笛卡兒的形而上學出發的。像費爾巴哈——因為他以為思辨哲學是神學底最後的支柱，又因為他使神學者不得不從虛飾的科學逃避到粗野的討厭的信仰，——因對於思辨的神學的鬥爭而推進到對於思辨哲學的爭鬥一樣，宗教的懷疑也使得貝爾發展到對於支持這個信仰的形而上學的懷疑。因此，他在其全歷史的過程中把形而上學批判了。他成了寫牠的死之歷史的歷史家了。他特別是反對了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

貝爾不只是因把形而上學解體為懷疑論替唯物論及常識的哲學準備了在法國的採用。他用如次的證明告知了反神的社會即刻就會開始存在，即這樣的證明：一個純粹反神論者的社會會存在，反神論者是可以為一個可尊敬的人，人類的墮落不是因為反神論，而是因為迷信及偶像崇拜。

借用一個法國的著作家的表現，則貝爾是「在十七世紀的意義上的最後的形而上學者，在十八世紀的意義上的最初的哲學家」。

除了對於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反神學之消極的反駁以外，人們還需要一個積極的反形而上學的體系。人們需要一本書，把當時的生活的實踐形成體系而附以理論的基礎。洛克的『

人類悟性起源論」好像被招待了一樣，從海峽的彼方來了。這本書像是等待了好久的上客一樣，受了熱烈的歡迎。

這裏有個疑問：洛克是不是斯賓諾莎的班徒？「世俗的」歷史會答覆吧；唯物論是大不列顛的嫡生子。牠的經院派學者 Duns Scotus 已經提起了這樣的問題：「物質是否能够思維？」……（註）

（註）底下還有一段，恩格斯已引用在他的「史的唯物論」中了，這裏就把牠省略不再收錄。

洛克的書對於法國人是怎樣的適逢其會，我們已經敘述過下。洛克建設了 bon sens 的哲學即常識的哲學，這就是等於迂迴地說沒有把健全的人類的感覺和根據於此的悟性區別出來的哲學家。

洛克底直接的弟子及法國的翻譯者孔狄惹克即強調洛克的感覺主義對着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了。他證明了法國人非難形而上學為想像力及神學的偏見之單純的產物是正當的。他公表了一個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和馬丁布蘭斯底體系之反駁。在他的著作「關於人類知覺底起源的論文」（*Traité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中詳述了

洛克的思想，而且證明了不只是精神，就是感覺，不只是製造觀念的技術，就是感性的感覺之技術，也都是經驗和習慣的事實。所以人類的全發展是依屬於教育及外部的環境的。孔狄惹克因折衷主義的哲學才被迫逐於法國的學派外了。

法國的和英國的唯物論之不同是兩者國民性底不同，法國人給與了英國的唯物論以精神，肉與血，雄辯。他們給了牠以牠還缺少的氣質及優美。他們把牠文明化了。

在同樣是從洛克出發的黑爾惠修斯，唯物論接受了法國固有的性質。他即在社會的生活之關聯上把握了唯物論，（黑爾惠修斯，人。）感性的性質及自愛，享樂及理解了的個人的利益害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人類的智慧之自然的平等，理性的進步與產業的進步間的統一，人類底自然財產，教育底萬能，這些是他的體系之主要的要素。

在拉梅特利的著作中，看得到笛卡爾的唯物論與英國的唯物論的合一。他利用笛卡兒的物理學到了個個的特殊點，他的人類關械（*Phommemac hine*）是笛卡兒的動物機械（*Tier-Machine*）的完成。在荷爾巴侖（*Holbach*）的自然體系（*Système de la Nature*）中，像道聽的部分本質地是以黑爾惠修斯的道德論為基礎一樣，物理的部分同樣地是成立於法國的唯物論和英國的唯物論之結合。還是與形而上學結合着的，因此也為黑格爾

所稱讚的法國的唯物論者洛畢勒（Robineau）（關於自然·*be la nature*）明顯地是與萊布尼茨有關係。

在我們證明了法國的唯物論底一方面從笛卡兒的物理學及他方面從英國的唯物論這個兩重的起源，又證明了法國的唯物論之對於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的對立及對於笛卡兒，斯賓諾莎，馬爾布蘭施及萊布尼茨的形而上學的對立以後，我們就沒有論述伏爾勒（Volney），丟皮易（Daudis）及狄德洛（Diderot）等的必要了，同樣也沒有論述重農學派的必要了。這個對立，要在德國人自己與思辨的形而上學對立了以後，才能對於他們明瞭起來。

像笛卡兒的唯物論成了獨特的自然科學一樣，法國的唯物論之另一個方向則直接地注入於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了。

要從根源的性質，人類底平等的智力，經驗，習慣及教育底萬能，外部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產業底重要的意義，享樂底權利等這些唯物論的學說洞察牠與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必然的關聯，是不需要什麼非常銳敏的觀察的。如果人類是從感覺世界及在感覺世界中的經驗形成一切的認識及感覺等，則這是很重要的，人類要把經驗的世界這樣地整理，好使他在這世界中經驗眞的人類的東西，習慣於這世界，以致他把自己當做人類來經驗。如果共知的

利害是一切道德的原理，則這是很重要的：人類底私的利害要與人類底利害一致。如果人在物論的意義上是不自由，即如果人不是因避免這個和那個消極的力量，而是因主張眞的個性的積極的力量得到自由，則我們不應以犯罪歸之於個人而罰他，應該破壞犯罪之反社會的發生地，而且要給與個人的本質的生活表現以充分的社會的餘地，如果人是爲環境所造成，則他就應該人類地造成環境。如果人性質上生來就是社會的，則他要在社會中才能發展他的真的性質，而我們也不應從各個人的力量，而應該從社會的力量來測量他的性質底力量。

就是在最古的法國的唯物論者中，我們可發見差不多字句都是一樣的這樣的及類似的句子。這裏不是批判牠的地方。顯著地表現了唯物論之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是曼德惠爾（Mandeville）——洛克的舊的英國的學徒——的罪惡底辯護（Apologie der Laster）。他證明罪惡在現在社會中是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但這不是現在社會之辯護。

傅立葉（Fourier）是直接地從法國唯物論者底學說出發的。巴布服派（Babouvisten）是粗野的還沒文明了的唯物論者，但發展了的共產主義也是直接地從法國的唯物論來的，這個唯物論帶着黑爾惠修斯所給與牠的形態又復歸到牠的母國——英國去了。邊沁（Bentham）以黑爾惠修斯的道德爲基礎，建設了他的理解的相益底體系，像歐文（Owen）從

邊沁的體系出發而建設了英國的共產主義一樣。追放到英國的法國人卞佩（Cibsat）爲英國的共產主義的思想所刺戟，又回到法國，成了最出名的（雖然是平凡的）共產主義的代表者了，比較更合於科學的法國的共產主義者，德查米（Desamy），格易（Gay）等，像歐文一樣，以唯物論的學說爲眞的人道主義的學說及共產主義底論理的基礎。……

註釋。法國唯物論與笛下兒及洛克的關聯，十八世紀的哲學對於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的對立，都在多數的新的法國哲學史中詳細地敍述了。在這裏，爲要對抗批判的批判，我們只須把周知的事實再來重述一遍。反之，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與十九世紀的英法的共產主義的關聯是需要更詳細的說明。我們只引用了荷爾巴哈，黑爾惠修斯及邊沁的兩三有特徵的地方。

「黑爾惠修斯」。人類不是惡的，但依從於他的利害。所以人們不應嗟嘆人類的壞惡，而應嗟嘆立法者底無知，這些立法者是常把特殊的利益與普遍的利益對抗的。「——道德家從來沒有過什麼結果，因爲人們要裂去罪惡之創造的根源，就必須在立法中穿鑿。在新阿列安（New Orleans）地方，婦人可以離棄她的丈夫，只要她一對於他的丈夫覺着厭倦。在這些地方，人們找不到虛偽的婦人，因爲做一個虛偽的婦人於她們沒有什麼利益。「——如果不能與政治及立法結合，道德只是一個沒有意思的科學，「——人們知道一個僞善的

道德家，一方面在他用來觀察解體國家的罪惡的冷淡，他方面在他對於私人的罪惡的憤怒——「人生來不是善，也不是惡，但可以爲善或可以爲惡，看共同的利益是與他結合或與他分離。——像市民如不能成就一般的幸福，則也不能成就他的特殊的幸福一樣，除愚人外也沒有什麼罪人。——（*Dal.esprit*，巴黎，八二二年，一一七頁，二四〇頁，二九二頁，二九九頁，三五二頁，三六九頁及三三九頁。）——黑爾惠修斯的意思以爲人類是爲教育（他這個教育不只是有普通的意義，而是一個個人底生活關係之總體）所造成，如像這樣，如果爲除去個人特殊的利害與共通的利害間的矛盾，需要改革的時候，則他方面爲要貫徹這個改革還需要一個意識底變更：人們只因把人民對於舊法律及習慣的愚鈍的尊敬弱化，才能實現這個大的改革。（二六〇頁）或者是像他在別處所說的一樣，除去人們的無知。

2. 荷爾巴哈。在他所評量的對象中所看到的東西，只是他自己。在他的種底存在中所愛好的東西，只是他自己。……人決不能與他自己分離，就是在他一生的任何瞬間：他自己不能離開他自己的視線。……使我們愛好或厭惡對象的，只是我們自己的利害關係。（社會的體系，*Systèmesocial*.第一部，巴黎一八二三年，八〇頁及一·二頁。）但是：人應該在自己的利害中愛好他人，因爲他們對於他的生存是必要的。……道德給他證明了：在一切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的存在中，對於人類最重要的東西是人類」。（七六頁）「真的過德和真的政治一樣，是使人類在意見上互相接近，以一致的努力來謀相互的幸福。把我們的利害從我們同類的利害分離出來的道德是虛偽的，無意義的，違反自然的道德」。（一一六頁）「愛好他人……等於把我們的利害與我們同類的利害結合而謀共同的功利。……道德只是結合在社會中的人類之功利」。（七七頁）「沒有熱情或沒有希望的人類就不是人類。……完全與自己分離了的人可以心服於他人嗎？對於一切都是無關心的，沒有熱情的，又自己滿足於自己的人不會再是一個社會的存在罷。……道德只是幸福底傳達」。（一一八頁）「宗教的道德決不能把人類更社會化。」（三六頁）

3. 邊沁。我們只引用邊沁攻擊「在政治的意義上的一般的利害」的地方。「個人的利益應該對公共的利益讓步。但……這是什麼意思？每個個人不也和每個他人一樣。是全體底一部分嗎？使你人格化的公共的利益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這只表示了個人的利益底集量。……如果犧牲一個人的幸福來增加他人的幸福是好，那末，第二個，第三個無限制地犧牲其幸福，還為更好罷。……個人的利益是唯一的真實的利益。」（「Theorie der Schärfen und der Belohnungen, etc.」，巴黎一八三五年，第三版，二二〇頁。）

# 馬克思的唯物論

恩格斯

## 馬克思底唯物論與辯證法（註）

（註）這是從馬克思「經濟學批判」之評論（一八九五年）中抄錄出來的。恩格斯的這個評論發表於一八五九年在倫敦出版的德文雜誌「民衆」（Das Volk）。（後來又收錄於Drebb所編的恩格斯選集，維也納，一九二〇年）

……這個德意志的經濟學本質地是很基於歷史之唯物論的把握，這個史觀的特徵已經在上面所引的著作底序文中簡單地敘述了。這個序文的主要事項也已在「民衆」雜誌中發表過了。不但對於經濟學，對於一切歷史的科學（除自然科學外，一切的科學都是歷史的），這個命題是革命的發見，「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規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一般」；出現於歷史中的一切社會的及政治的關係，一切宗教的及法律的體系，一切理論的觀念，都要在那個相應的時期之物質的生活條件理解了以後，才能理解，而前者又是從這些物質的條件誘導來的。「不是人底意識規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社會的存在規定他的意識」這個命題是

這樣的簡單，以致對於每個沒有中觀念論的毒的人都是自明的道理。但不只是對於理論，對於實踐事實也有最大的革命的關係：「在其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上，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必會與牠本來在其中活動過的現存的生產關係，或者是只不過為牠的法律的表現的所有關係相衝突。這種種的關係從生產力底發展形態轉變為牠的桎梏。這時候，社會革命的時代要到來。同經濟的基礎底變動一起，巨大的上部構造也都緩徐地或急速地變革。……資產者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產過程之最後的敵對的形態，這所說的敵對的意義不是個人的敵對，而是從個人底社會的生活條件發生出來的敵對，但在資產者社會的懷裏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成了了解決這個敵對所必需的物質的條件。「這樣，我們的唯物論的主旨之更進一步的追溯及牠對於現代的應用給了我們一個對於偉大的，一切時代的最偉大的革命之預期。但更深入的觀察也指示了我們：人的意識依屬於他的存在，不是存在依屬於意識這個表面上是這樣簡單的命題同樣在牠的第一個結論上就直接地與一切的觀念論（就是最潛隱的）相衝突。關於歷史的事件之整個傳統的及習俗的見解都為牠所否定了。政治的批判之全部傳統的方法墮地了；愛國的義氣憤怒地與這樣無定見的見解抵抗了。因此，這個族的思想方法必然地不但要觸犯資產階級之代表者，且觸犯了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這些社會主義者是想用自由、博愛這樣的魔術

形式來改進世界的。……

……自黑格爾死了以後，未會有過一個在她固有的內在的關聯上發展科學的企圖。公認的黑格爾學派從祖師法辯證法只學得了最簡單不過的知識之操縱，他們把這此知識常以可笑的拙劣應用到一切的事物，黑格爾的全部遺產對於他們真是一個純粹的模型用這個模型來構成一切的主題；又只是一個生字及用法的索隱，這個除了備需要的時期的考查以外，沒有別的目的，而在這裏是沒有思想及積極的知識的。所以終成了這樣的情形。像一個 Bonn 的教授所說的一樣，這些黑格爾派什麼東西都不懂，但什麼東西都能寫。這自然也是這樣。因為這些先生們，雖然他們很自負，很知道他們法弱點，所以他們儘可能的避開大的問題。因對於積極的知識之思慮，舊的固陋的科學主張了牠的地盤，當費爾巴哈對思慮的概念發了警告的時候，黑格爾派就漸漸地頹喪了，而且好像舊形而上學的王國帶着牠法固定範疇重新又在科學中開始了。

這此事實是有牠的自然的根據的，在黑格爾的純是賣弄言辭的病狀的統治後，自然的接著來了一個時期，在這時期中，科學之積極的內容又戰勝了形式的方面。但同時德意志也用全力來從事自然科學，恰與一八四八年以來的資產階級的巨大的發展相對應。因這個自然科

學的盛行（在這裏，思辨的傾向決不能適用），思維之舊形而上學的方式也墮到了極端確的  
爾夫（Wolff）式的淺薄平板了。

黑格爾被忘却了，新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發達了，這個唯物論與十八世紀的唯物論理  
論差不多是沒有區別，而只是有了更豐富的自然科學的、特別是化學的及生理學的材料。  
還元到極端的平易，我們看到前康德時代的狹量的俗人之思維方法在畢希勒爾（Biehler）  
，和格特（Vogt）及普約費爾巴哈的摩勒叔（Müller）以最愉快的方式騎乘於最簡  
單的範疇之間。資產階級的日常知識之強勁的貨車馬自當很迷惑地停足在一個濛溝之前，這  
個濛溝是把本質從現象，原因從結果分離的。但如果人們想在抽象的思維之很峭峻的地域逍  
遙，則不應想騎貨車馬。

這樣，這裏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這問題是與經濟學沒有關係的。科學是應該怎樣去研  
究？在一方面，有黑格爾的辯證法，在他所留給牠的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態上；在他方  
面，有普通的，現在又在流行的，本質地是霍爾夫式的形而上學的方法，用這個方法資產階  
級的經濟學者也寫了不相聯貫的厚大的著作。這個霍爾夫式的方法被康德特別是被黑格爾理  
論地這樣地打破了，以致只有慣性及別的簡單的方法之缺乏才能使牠的實際的繼續存在成牠

可能。他方面，黑格爾的方法在其現存的形式上是絕對不可用了。牠本質地是觀念論的這，裏是關於一個世界觀的發展，唯物論的是爲最早的。牠是從純粹的思維出發，而這裏是應從最強固的事實出發。一個方法，照牠自己的自認講，是「從無經過到無」（Von nichts aus zu nichts zugegangen）的，這樣形式的方法在這裏是決沒有地位的。雖然是這樣，牠

還是一切現存的論理的資料中的唯一的一份，至少是可以聯繫起來的。牠沒有被批判過，也沒有被克服過；這個偉大的辯證家底反對者中，沒有一個能送一點破孔到牠的驕矜的建築中。牠被忘却了，因爲黑格爾學派不知道把牠怎樣着手才好。在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是把黑格爾的方法拿來決定地批判。

黑格爾的思維方法比其他一切哲學家的思維方法要優越的地方是爲牠的基礎的巨大的歷史的意義。形式是這樣抽象的和觀念論的，則他的思想發展也這樣的與世界史的發展平行，而世界史的發展本來只應是思想發展的證驗。雖然因此把正當的關係顛倒，而以頭頂地，然在這個哲學中到處都包含了真實的內容。黑格爾也因此與他的學徒們有區別，他不像他們一樣，誇張自己的無知，他是一切時代的最有學識的頭腦。他是想在歷史中證示一個發展及內在的關聯的第一人。我們現在在他的歷史哲學中可以發見許多很珍奇的東西一樣，則他的偉

大的根本思想自身在現在也還是值得注意的。在現象學、美學及哲學史中，到處都貫徹着宏大的歷史觀，而材料到處都是歷史地，在與歷史的一定的（雖然是抽象地顛倒了的）關聯上被研究。

這個劃時期的歷史觀是新的唯物論的思想之直接的理論的前提，而因此對於論理的方法也生出了一個結合點。如果這傳被忘了的辯證法從「純粹的思維」之立腳點就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結果，加之牠與從前一切的論理學及形而上學斷絕了關係，則無論是何，牠是詭辯及曲論以上的東西。但這個方法與批判，一切官認的哲學從前不敢，現在還是不敢做的這個方法底批判，并不是什麼小事。

馬克思曾經是，現在也是能够擔任這個事業的唯一的人，從黑格爾的論理學攝取其精華，這精華是把黑格爾的實際的發見包括在這個範圍之內的，剝去辯證法的方法之同一的（觀念的）衣裳而恢復到簡純的形態，在這個形態上，牠是思想發展之唯一的正當的形式。辯證法是為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之基礎，這方法的完成我們以為是一個結果，且在意義上並不弱於唯物論的根本思想。……

……這樣，只論理的研究方法成為問題。但這個方法事實上不外是歷史的方法，剝去其

歷史的形式及攪亂的偶然性。歷史所用以開始的地方，思想的進程也應以之開始，而思想進程底向前的進步也不外是這個映像，但為實際的歷史的進程自身所給與的法則所修正，所以在牠的完全的成熟及優越之發達點上的每個契機都可以考察。

在這個方法，我們從歷史地且事實地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前的及最簡單的關係開始，所以這裏是要從我們所遇到的第一個經濟的關係出發的。我們分解這個關係。在這是一個關係這事中已經就包含了互相交涉的兩方面。這兩者的每個都可以單獨地來觀察；從這裏發生相互的交涉底樣式，牠的相互作用。牠自己會發生希求解決的矛盾。但因為我們在這裏不是論究只是在我們頭腦中能發生的抽象的思想過程，而是論究在某個時代實際地曾經發生過或還在發生的現實的過程，則這些矛盾也在實踐中發展，而赫然地找到了牠的解決。我們將追究這個解決的樣式，於是知道牠要因一個新的關係之產生而遂行的，這個新關係之兩個對立的方面我們以後將要論究的。……